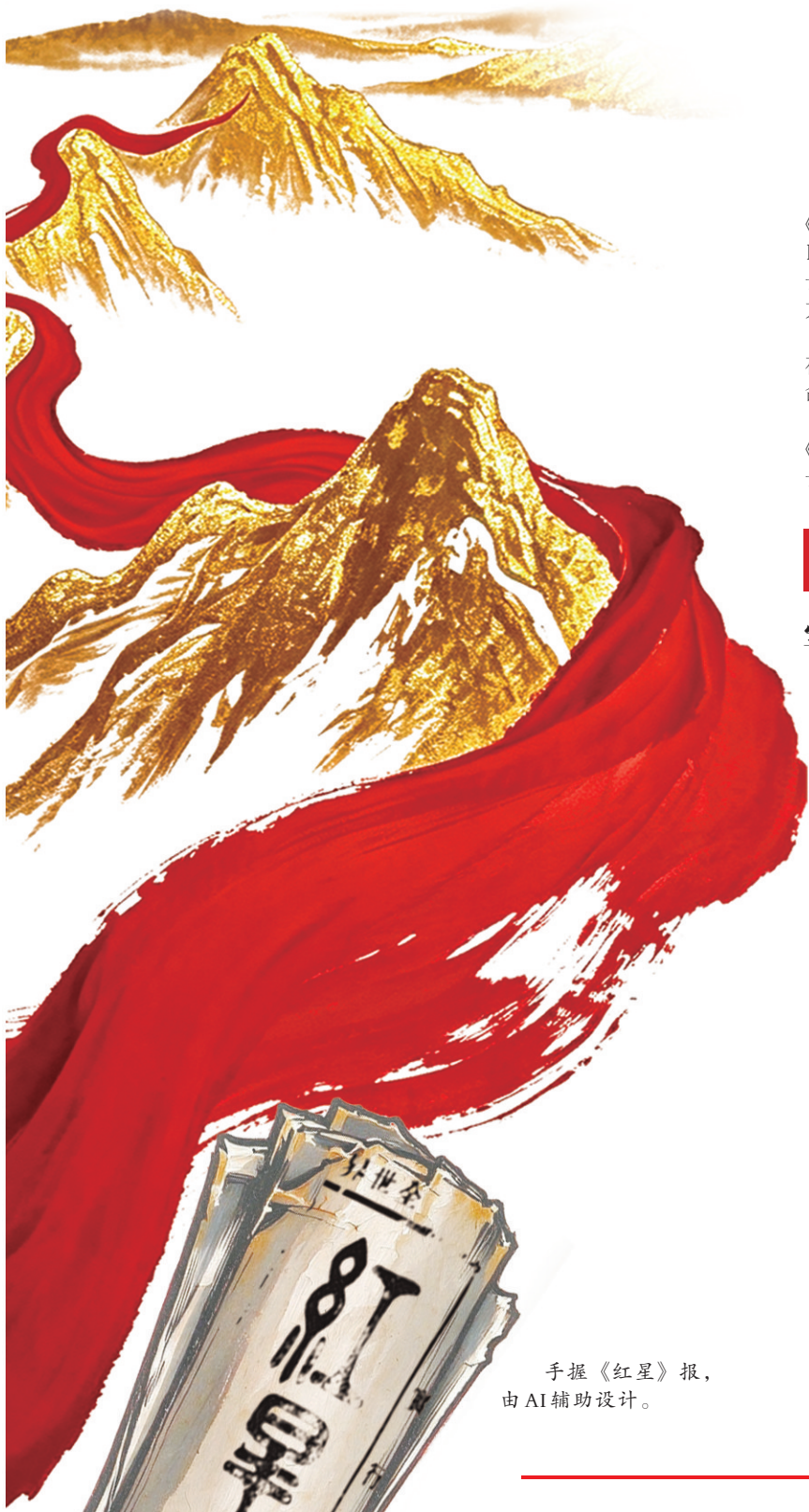


英雄史诗
 伟大转折

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
 1936-2026
 特刊



《红星》报创刊号。图源：《团结报》



手摸《红星》报，由AI辅助设计。

遵义会议精神当时如何传达？

本报记者 陈江南

【《红星》报摘要】“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“围剿”总结的报告，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……”——1935年2月19日《红星》报长征专号第十二版

秋季的黔北，阳光下的遵义市子尹路96号二层临街小楼窗棂庄严，91年前，中共中央正是在这栋二层小楼里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。遵义会议系统总结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经验教训，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，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，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、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中国革命。

然而，这一关乎党和军队前途命运的会议，其精神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行军打仗中传达至红军将士，成为会后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。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的，正是当时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在长征途中唯一坚持出版的机关报——《红星》报。

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、研究员肖裕声考证，1935年2月10日至3月4日，《红星》报长征专号第九期至第十一期先后刊载了《共产国际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红色指战员书》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》等内容。其中，1935年2月19日刊发的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》明确指出：“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政治局同志关于反对五次“围剿”总结的报告，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……”

肖裕声在长期研究中发现，这是党和军队发行的报刊上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宣传遵义会议决议精神、拥护遵义会议决议的报纸，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物。遵义会议后，《红星》报接连推出多篇重要社论，包括《为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而奋斗》《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，创造川陕甘新苏区》等文章，准确传达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，帮助红军官兵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，有效解除了此前弥漫在部队中的思想困惑，为下一步军事行动指明了方向。

遵义战役结束后，《红星》报长征专号第十一期又刊发社论《准备继续作战，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》，文中写道：“在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正确的军事领导之下，我们发挥了运动战的特长，六天之内击败了廿余团敌人，这证明了：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，只要不怕疲劳，勇敢作战，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的敌人。”

字里行间，“实事求是，独立自主”的战略思想已跃然纸上。同时，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、毛泽东、陈等，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。2月10日，军委纵队召开营、科级以上干部会议，由张闻天作《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总结和目前任务》的报告。这是第一次传达遵义会议精神。

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综合处处长肖定喜认为，1961年6月，朱德为纪念遵义会议作诗：“群龙得首自腾翔，路线精通走一行。左右偏差能纠正，天空无限任飞翔。”这首诗生动描绘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之后，在红军中发生的振奋人心的变化。

从党内的动员，到《红星》报的舆论呼应，遵义会议精神在全党全军得以迅速传达，大家统一了思想、增强了团结、提振了信心、明确了方向，为长征的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回望红军长征历史，一张报纸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长征的珍贵窗口——《红星》报。作为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、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，《红星》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瑞金，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，它不仅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浴火重生足迹，更以报纸为阵地，报道为武器，凝聚起一支军队的精神力量。

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、研究员肖裕声评价道：“这份在枪林火雨坚守的中革军委机关报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以其顽强的生命力，成为红军战略大转移中最独特、最珍贵的文字载体。”

1934年10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，时任《红星》报主编邓小平带领报纸编辑部随第二野战纵队从江西瑞金出发，踏上长征路。10月20日，《红星》报发行了开始长征后的第1期，报头“红星”二字

专访

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、研究员肖裕声：

思想宣传阵地不能丢 党的声音不中断

本报记者 陈江南

7月在杭州举行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、研究员肖裕声对《红星》报长期的研究积累，将这份90余年前随红军长征辗转的报纸重新带回公众视野。在他看来，这份报纸，不仅是一份新闻出版物，更是一份鲜活的档案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。

早在30年前，肖裕声第一次接触到《红星》报原件后，便对这份报纸进行系统性研究。“我们谈它，不只是谈历史结果，更能谈到长征途中发生的历史过程，看到当时队伍的困惑、喜悦、思考。”

肖裕声认为，这正是《红星》报的特别之处：它不是事后总结出来的结论性文本，而是军事斗争进行过程中，由一线记者编辑在战火中采写编发的第一手现场记录，具有极强的史料真实性和即时性。

从军事史角度看，《红星》报记录的不仅是战事捷报，还涵盖了思想斗争、行军卫生防护、基层思想引导等内容，更多维度呈现了长征途中的红军。肖裕声指出，正因为当时油墨有限，纸张紧缺，部队随时转移，每一期报纸能够坚持印出来，本身就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史。他将这份报纸定位为“既是历史档案，也是战时舆论武器”，强调其在军事

正是邓小平的手笔，头版刊登社论《突破敌人封锁线，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》，铿锵有力的话语给红军将士和沿途百姓极大鼓舞。

湖南通道会议后，中央红军分两路纵队向贵州省黎平县进发，拉开了转战贵州的序幕。1934年12月18日，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，正式决定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。这一天，红军总政治部在黎平城荷花塘召集群众大会，《红星》报在长征专号第七期第2版中，以《黎平城的群众大会——到会三四百人 分发大批东西》为题作了相关报道，记录下红军向百姓分发物资的经过。

1935年1月2日至6日，中央红军兵分3路从瓮安江界河、余庆回龙场、开阳茶关等处突破乌江，一扫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，《红星》报当时以《开展胜利的反攻用最顽强的战斗争取全攻反攻的胜利》通栏标题，刊登《伟大的开始

中央始终坚持“思想宣传阵地不能丢、党的声音不能中断”的信念，这正是《红星》报留给后人最动人的精神特质。

站在军事史的视野来看，《红星》报不仅为党中央和军委掌握全军真实状态、作出战略决策提供了来自基层一线的真实反馈，也在突破乌江、遵义会议等关键历史节点上，一次次吹响战斗号角，统一全军思想，成为那个电台通信条件有限的年代里，政策精神能够迅速落地到每一支连队的重要载体，对保障军事斗争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回望这份90余年前的报纸，肖裕声认为其启示至今历久弥新：新闻舆论工作必须紧跟大局，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话讲清楚；讲述党史与红色历史，要还原一手原始史料，拒绝概念化、脸谱化叙事，真实还原历史现场的复杂与艰难；面对困难环境，坚守阵地、斗争精神永不过时。

肖裕声强调，今天借鉴的不是照搬当年具体做法，而是汲取其站稳立场、扎根受众、尊重史实、危难之中不放弃思想阵地的核心逻辑，这对做好新时代军事新闻宣传与舆论工作，仍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

【《红星》报摘要】“（“冲”部六连）该连在杨指导员坚决领导之下，一次以六个人击溃敌人二十人。最后以四个人抗拒敌人约一团，直到增援部队到达……”——1935年3月10日《红星》报长征专号第十二期第一版

红军长征首获大胜如何报道？

本报记者 陈江南

娄山关小尖山下，一座红军战斗纪念碑静静耸立。碑文上镌刻着张爱萍将军的《西江月·遵义大捷》：“长征首获大胜，转战历数艰辛……”往来游客驻足瞻仰题词，回顾烽火岁月。

1935年2月上旬，红一军团、红三军团、军委纵队先后进至云南扎西（威信）地区。其间，中央政治局召开扎西会议，作出“立即回兵黔北、二渡赤水、重占遵义、出其不意歼敌人一个回马枪”的战略决策。

彼时，蒋介石调集几十个团在长江南岸布防，妄图将红军围歼于川南，却不料黔北兵力空虚。2月18日至21日，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，直插黔北。2月24日拂晓，红一、二军团攻占桐梓县城，首战告捷，士气大振。

真正的硬仗在娄山关打响。2月25日，彭德怀率红13团为前卫，2团从中路支援。红13团连日长驱直入，政委李德富率部仰攻娄关，一营攀悬崖直取制高点——点金山，与敌展开白刃肉搏，终于抢占山头。战至下午5时，红军连续突破敌军防线，攻占娄山关西侧十余处山头，将敌军逼至关南黑神庙一线。

从2月24日到3月1日，中央红军连下桐梓、娄山关、遵义，以3万之众，歼敌2个师又8个团，俘敌3000多人。

《红星》报发表社论，指出：“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，也是反对五次“围剿”以来一年半空前的大胜利。”蒋介石称遵义战役是“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”。

在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彭洲飞看来，遵义战役是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经验教训，确立正确军事路线之后，主动寻求变革的重要战役，扭转了红军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。

战后，毛泽东策马经过娄山关，写下了气壮山河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，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团政委张爱萍也先后赋词纪念此役，称其为“长征首获大胜”。

从强渡乌江的“伟大的开始”，到娄山关大捷的“长征首获大胜”，两场战斗前后呼应，勾勒出红军在绝境中转危为安、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历史轨迹。



印刷《红星》报的手痕油印机。图源：中国军网

《红星》报里读长征

本报记者 陈江南

——一九三五年第一个战斗，对红军突破乌江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，认为这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战役。

遵义会议后，《红星》报长征专号第九期至第十一期（1935年2月10日至3月4日）刊载了《共产国际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全体红色指战员书》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》等内容，特别是2月19日刊发的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》，以“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”等内容，迅速向全军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，是目前发现的红军公开报道并拥护遵义会议的报刊文献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。此后，《红星》报又先后发表《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奋斗》等社论和文章10余篇，传达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，进一步统一全军思想，坚定了必胜信心。

“这些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告诉大家为什么而战，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，

告诉大家胜利终究会来，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就像一盏明灯，照在战壕里，照在行军旅途中，照在每个红军战士的心里。”原北京军区《战友报》社社长邱继昆说。

《红星》报的报道并不只聚焦于战斗胜负，更记录着军民之间的血肉联系。《遵义全县群众大会上成立革命委员会》《商榷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》《明日午三时举行遵义城群众庆祝大会》等报道，记录了遵义百姓箪食壶浆、争相欢迎革命队伍的动人场景，从侧面印证了红军纪律严明、赢得民心

长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后，为维护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，做好少数民族工作，《红星》报也多次针对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发布工作提示，帮助指战员及时掌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，如《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》《注

专访

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、教授曹培鑫：

让红色报史成为滋养初心的精神资源

本报记者 黄蔚

《红星》报在长征途中由铅印改为手刻蜡版油印坚持出版，这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曹培鑫看来，是创造了革命新闻史上的奇迹。在红军转战的艰苦局势上，办报人员背着油印机随军行进，边走边办，在物资匮乏、战事频繁的非正常条件下坚持出版，是长征途中唯一的机关报，生动诠释了“新闻宣传也是战斗力”。

作为红军重要的宣传阵地，《红星》报的核心价值现在凝心聚力、服务大局上。彼时部队长期转战，思想易出现涣散波动，《红星》报及时传达中央战略部署，解读红军北上抗日、创建新苏区的奋斗目标，为全军统一思想、明确使命筑牢认知根基。同时，报纸还以人民为中心，不能只对上不对下，要回应群众急难愁盼，做好话语转化，把大政策转成老百姓听得懂、用得上、能共情的话，进行分众化精准传播，

曹培鑫分析认为，这一实践也为当代新闻传播提供了重要镜鉴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不能只对上不对下，要回应群众急难愁盼，做好话语转化，把大政策转成老百姓听得懂、用得上、能共情的话，进行分众化精准传播，不同群体用不同方式；尊重民族差异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要把传播和服务结合起来，既报道问题也推动解决问题。“说白了，新闻传播要有人气、接地气，才能有底气、聚人气，今天讲党管媒体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，源

头就在这儿。

“贴近人、服务人是《红星》报最动人的特质”，曹培鑫谈道。报纸立足官兵与群众的日常需求，《红星》报设有“卫生常识”，告诉大家不喝凉水不生病、怎样解决草鞋问题、预防风咳嗽、消灭肠胃病；有“争取群众工作”，讲上房下、掘禾草、打扫房子、拆坏东西要赔、买卖公平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，又宣传民族平等、民族自决，纠正“蛮”字这种歧视性表述等。这些内容贴近群众，都是战士和群众身边碰到的实际问题。语言也通俗，有歌谣、漫画、歌谣、漫画、家信、正反典型一起用，既有激励也有警示；注重情感共鸣，把大道理变成身边故事。这些对于今天提升新闻舆论“四力”仍有启示：把党的主张和群众需求结合，把政策转译成故事，把传播嵌入服务；要用好全媒体，分众化表述、互动式参与；还要让编辑记者到基层去，到现场去。这样新闻舆论工作才能既有高度，又有温度，还有实效。

曹培鑫表示，《红星》报留存着红色新闻史料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在新时期用好这些史料，做好整理和数字化，将其纳入新闻传播教育，创新展陈和传播形式活化红色资源，让红色报刊史料转化为滋养初心、砥砺前行的精神资源。

纵观《红星》报在长征时期的办报实践，曹培鑫认为有五点经验：坚持党的领导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，宣传紧贴战略任务；贯彻群众路线，让官兵参与写稿、读报、用报；服务现实需要，部队缺什么、怕什么、愁什么，报纸就讲什么，给什么办法；创新方法，社论、捷报、歌谣、漫画、家信、正反典型一起用，既有激励也有警示；注重情感共鸣，把大道理变成身边故事。这些对于今天提升新闻舆论“四力”仍有启示：把党的主张和群众需求结合，把政策转译成故事，把传播嵌入服务；要用好全媒体，分众化表述、互动式参与；还要让编辑记者到基层去，到现场去。这样新闻舆论工作才能既有高度，又有温度，还有实效。

曹培鑫表示，《红星》报留存着红色新闻史料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在新时期用好这些史料，做好整理和数字化，将其纳入新闻传播教育，创新展陈和传播形式活化红色资源，让红色报刊史料转化为滋养初心、砥砺前行的精神资源。



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、教授曹培鑫，受访者供图

长征路上动员方式好丰富
 写标语、唱歌谣、开大会、演话剧

本报记者 黄蔚 实习生 葛文雯

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标语展区，“红军到，千人笑”的醒目标语令观众驻足。讲解员解释道，贵州贵州的方言中，“千人”即穷苦群众。贵州全境无平原，旧时交通闭塞，百姓饱受军阀压榨和苛捐杂税盘剥，终年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，被形象称作“千人”。一条标语，映照出一支军队与一方百姓的紧密相依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出发前夕，红军总政治部下达《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》，明确要求全军“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……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（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）”。遵义会议后，为宣传政治主张、发动群众、扩大红军力量，1935年2月27日，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发出《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的命令》，要求“凡能写字的，用木炭、用毛笔、用大字、用小手，在墙壁上，在门上遍写宣传材料，‘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’”。

“红军到，千人笑”这种简明生动、符合实际、贴近群众、通俗易懂的标语的出现，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和鲜明品格的生动表达。“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朱仁印介绍，彼时红军标语采用口语化表达，书写载体就地取材，木炭、锅底黑灰、红土皆为笔墨，房屋、岩石、石碑皆是阵地。标语主要讲聚平、乌江、遵义、娄山关、赤水这条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的主线分布，以及红二、六军团途经的黔东南、黔南、黔西、黔北等地，成为长征途中晚晚“千人”、凝聚民心、扩大红军力量等的重要抓手。”朱仁印表示，通俗直白的革命宣传，加上红军秋毫无犯、为民解忧的实际行动，彻底赢得了民心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贵州是长征途中扩红人数最多的省份，累计约16万名各族青年参军入伍。

鲜活生动的活报剧、民间小戏，则让革命道理看得见、摸得透。中央红军在习水土城惠民官戏台演出话剧《打倒夏雨甫》，以当地民间团总夏雨甫为原型，演出后随即召开公开大会，揭发控诉其罪行，之后将打土豪投收的财产分给百姓。在黔西，红军演出革命小戏《土豪闹翻身》后，引发热烈反响。数百名青年深受感召，报名加入红军。

“红军转战贵州期间，标语、歌谣是政治动员的核心载体。二者共同把革命主张送到贵州大地，成为长征途中晚晚“千人”、凝聚民心、扩大红军力量等的重要抓手。”朱仁印表示，通俗直白的革命宣传，加上红军秋毫无犯、为民解忧的实际行动，彻底赢得了民心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贵州是长征途中扩红人数最多的省份，累计约16万名各族青年参军入伍。

标语是静态的“墙报”，歌谣则是流动的宣传。红军依托贵州本土山歌文化，沿用当地群众耳熟能详的民歌曲调，填入革命新词，通过群众大会宣讲、

现场教唱、街头传唱等方式，让革命理念扎根民心。由此构建“标语+歌谣+群众大会+活报剧”的立体化宣传模式，结合打土豪、分浮财等开展群众动员，形成一套从书写标语、教唱歌谣到群众动员的完整链条。

朗朗上口的红色歌谣，成为行走的革命宣言。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着一本黔东南《红军歌》抄本，1955年由印江自治县群众捐赠，收录《国际歌》《三大纪律歌》《行军歌》《农民歌》19首红色曲目，均为1934年在黔东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。当年，红军宣传队依托这些曲目，唱出倒土豪穷鬼、穷人翻身解放的革命诉求，唤起万千群众的抗争意识。

群众大会成为红军贴近群众、宣讲政策、吸纳新生力量的重要途径。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习潭后，召开1万余人的群众大会。据《红军在贵州史料汇编》记载，“两天内扩军600多人”。

鲜活生动的活报剧、民间小戏，则让革命道理看得见、摸得透。中央红军在习水土城惠民官戏台演出话剧《打倒夏雨甫》，以当地民间团总夏雨甫为原型，演出后随即召开公开大会，揭发控诉其罪行，之后将打土豪投收的财产分给百姓。在黔西，红军演出革命小戏《土豪闹翻身》后，引发热烈反响。数百名青年深受感召，报名加入红军。

“红军转战贵州期间，标语、歌谣是政治动员的核心载体。二者共同把革命主张送到贵州大地，成为长征途中晚晚“千人”、凝聚民心、扩大红军力量等的重要抓手。”朱仁印表示，通俗直白的革命宣传，加上红军秋毫无犯、为民解忧的实际行动，彻底赢得了民心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贵州是长征途中扩红人数最多的省份，累计约16万名各族青年参军入伍。

90余年来，木板上的标语仍在，村寨里的歌谣仍被传唱。长征播下的种子，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



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红军雕塑。本报记者 赵相康 摄

知名画家沈尧伊创作《长征是宣言书、宣传队、播种机》，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。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

本版责编：黄蔚 陈曦 姚曼 版式设计：王子琪 赵怡 彭舒妍